

「英國」以賽亞·伯林

观念的力量

观念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as

[英国] 以赛亚·伯林 —— 著

[英国] 亨利·哈代 —— 编

胡自信 魏钊凌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的力量 / (英)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著; (英) 亨利·哈代 (Henry Hardy) 编; 胡自信, 魏钊凌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4
(伯林文集)
书名原文: The Power of Ideas
ISBN 978-7-5447-6935-8

I. ①观… II. ①以… ②亨… ③胡… ④魏… III. ①伯林 (Berlin, Isaiah, 1909—1997)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4710 号

The Power of Ideas by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My Intellectual Path' ©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and Henry Hardy 1998
'The Search for Status' ©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00
Other essays © Isaiah Berlin 1947, 1951, 1953, 1954, 1956, © Isaiah Berlin 1960, 1962, 1966, 1968, 1969, 1972, 1975, 1978, 1979, 1995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2000, 2013
Foreword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7-408号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saiah Berlin visit <http://berlin.wolf.ox.ac.uk/>

观念的力量 [英国] 以赛亚·伯林 / 著 [英国] 亨利·哈代 / 编
胡自信 魏钊凌 / 译

责任编辑 马爱新
装帧设计 韦枫
校对 梅娟 张堃
责任印制 单莉

原文出版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箱 yilin@yilin.com
网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1/32
印张 14.625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7-6935-8
定价 7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以赛亚·伯林爵士

(Sir Isaiah Berlin, 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借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契机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5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伯林文集

- 卡尔·马克思（1939）
- 启蒙的时代（1956）
- 俄国思想家（1978）
- 概念与范畴（1978）
- 反潮流（1979）
- 个人印象（1980）
- 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
- 现实感（1996）
- 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
- 观念的力量（2000）
-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2）
- 自由及其背叛（2002）
- 自由论（2002）
- 苏联的心灵（2004）
- 伯林书信集 卷一（2004）
- 伯林书信集 卷二（2009）
- 伯林书信集 卷三（2013）
- 伯林书信集 卷四（2015）

特别收录

- 伯林传（1991）
- 伯林谈话录（1992）
- 未完的对话（2006）

参考文献说明

对本卷内容的参考引用，给出的页码均为本书页码 [中文版边码]。对多卷作品的参考引用，给出卷号和页码的，以“v 509”的形式标出，意为“第5卷第509页”。赫尔岑的作品引自 A.I.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Moscow, 1954—1966)，标注卷号和页码，注例如下：SS vi 33 (《往事与随想》第6卷第33页)。若标注精确到行，则以“viii 23.22”形式标出，意为“第8卷第23页第22行”。

xi

前言^[1]

阿维赛·马加利特

情感的哲学家

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是有力量的，语言并非“只有词语”^[2]。观念，至少某些观念，是“发自心灵的物质”，而非只是头脑的产物。

以赛亚·伯林有一本传记，但这本传记并非是他的个人履历。事实上，他的传记是典型的 20 世纪传记。而这部传记需要被重新评价。

要叙述伯林的一生，标准方式是这样的——这种方式是伯林本人曾推广过的：从前，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曾是一位哲学家，一位分析哲学家，在他看来过往的哲学总是提出古怪的问题，例如“时间是什么？”或者“时间可以停止吗？”^[3] 在解决或者说消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需要对

[1] 本书“参考文献说明”、“前言”和“第二版附录”由魏钊凌翻译，其余均由胡自信翻译。——中文版编注

[2] “词语，词语，只有词语，没有物质来自心灵”：William Shakespeare, *Troilus and Cressida*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5. 3。

[3] 参见下文第 31 页。

这些问题进行概念上的分析，以此直抵问题中关键词的意义，例如“时间”一词的意义。词语和词语的意义可以指引着我们理解这些古怪问题。事实上，分析哲学中的一支正是建立于伯林在全灵学院的课堂里，其泰斗人物是约翰·奥斯汀。

此后，故事继续。伯林不再热衷于将他的人生用在概念分析这种事上，转向更符合他的脾性和兴趣的东西，也就是观念史。当时，观念史还未被视为一门自主学科领域，而伯林为确立它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xiii

这本文集中的前两篇文章《我的学术之路》和《哲学的目的》向我们展现了伯林笔下的观念发展历程以及他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

有时，伯林离开分析哲学领域这件事看起来不单是一个受个人喜好引导而做出的个人选择，同时也反映了伯林总体上对分析哲学本身的反对立场。我记得我曾和他讨论过一个问题：分析哲学是不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工作，它永远都在磨刀，但却没有东西可以切？还是说这门学科就像亚伯拉罕·林肯所说——如果你要去砍树，最好先花六个小时的时间把斧子磨利，再只要花两个小时去砍树就可以了？他说，你看，你用明喻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这不已经说明了你并没有在思考哲学吗？我反驳说，不是的，维特根斯坦最棒的地方就是他的明喻手法，连他自己都是第一个这么承认的。这一点在伯林身上也一样。后面我会讲一个伯林使用的明喻。

就算如此，要讲述身为分析哲学家的青年以赛亚和身为

观念史学家的老年以赛亚，也有一个优势：直接明了。它为热情的年轻学者免去了一些压力，不必强行在以赛亚·伯林身上寻找本不存在的连续性。

但是，我认为以这种方式讲述伯林，如果不是对他的一种误解，也有一些东西被忽视了。伯林的关注点确实发生过变化，但这一变化并非是从哲学到历史。伯林的转向，是从一种哲学家转向另一种哲学家：从关心意义的哲学家转向关心情感的哲学家。

在这本文集中，伯林思考了他所说的“哲学的目的”。

xiv 在那篇文章中，他没有直接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描述分析哲学，而是借助哲学尝试解决的问题来思考它，有些问题听上去颇为幼稚：“当我看到重影时，那究竟是两个什么？”^[1]但是很快我们发现，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像回答事实性的问题一样，比如：“我的上衣在哪儿？”^[2]前者带有批判性，涉及对我们使用的关键术语（概念）的意义的叙述（“分析”），如“时间”、“思维”、“知识”。

但是，在他举出的哲学问题中，他也提到了“所有的人真的都是兄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弄清楚“兄弟”的意义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情感。

术语出现于表达之中，表达有事实性，而术语的意义和

[1] 参见下文第 31 页。

[2] 参见下文第 29 页。

它对这种事实性的系统贡献有关。研究情感意味着尽可能地
不讨论意义，而将关注点转至系统关系和情绪联想以及伴随
术语的相关文化和历史内涵上。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的“诚
实性”和“真实性”，以及伯纳德·威廉斯所说的古希腊语
境下的“耻辱”和“必要性”，都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哲学应
该关照的显著例子。研究情感哲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和历史
变化，不过这并不会让它成为观念史。

意义的哲学基于一种普通的语言。如果我们用英语举例，
那么它就基于某个特定时间的英语。分析英语术语意义的哲
学家不需要用到这门语言的历史，就像面对着某个棋局的象
棋选手不需要知道这个棋局是怎么一步步下出来的一样。但
是对于情感的哲学而言，一门语言的历史（历时）维度就十
分重要了。可以说，人们大致上公认，内涵和联想存在着一种交流法则。内涵不会消亡，只会渐渐淡化到背景之中。 xv

以赛亚·伯林将他的关注点从意义转向了情感，但即便
是他成为“观念史学家”之后，意义也并未从他的视野中消失。
伯林不是还不辞烦劳地提出和捍卫了他有关“自由”的两种
意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著名区别吗？

在第一种意义下，亦即消极意义下，自由指没有阻碍我
们行为的人为障碍。在第二种意义下，亦即积极意义下，如
果我们掌控着自己的目标，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能够在达成
目标时实现自身之中的至善，我们便是自由的。伯林相信，
对于许多目标的追求都能使我们实现自身之中的至善，我们

可以在这些目标中做出选择。但是，我们无法通过追求选择的目标来选择实现自身之中的哪种善：实现的善是追求目标的一个本质的附带产物。

有人曾批评伯林，认为他给“自由”赋予太多的意义：他坚持认为有两种自由概念，而批评他的人则认为只有一种自由概念，但自由的用途有多种；这种自由概念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综合。自由就像三位一体一样，是一种概念三种元素。A之自由基于没有人为的障碍B阻止A从事或者变成C；也就是说，他免于束缚，因此可以不受约束地实现他的目标。

这一批评并没有阻止伯林坚持认为就是有两种自由概念。有一天，我和他一起走在他位于黑丁顿的房子门前的路上，他通常走这条路去牛津全灵学院。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俩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边走边聊，聊到自由的三位一体问题。突然，我们的路被一道篱笆挡住了，以前这里并没有这道篱笆。伯林马上反应说：这就是挡住我的自由的障碍。这道篱笆并没有阻止我实现我的目标。我并不想去全灵学院，
xvi 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只是想这么走下去，不要被挡住。他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犀利，让人无法反驳：这道篱笆是对我们的自由的一种直接限制；要证明这道篱笆阻碍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并不需要它阻拦我们前往全灵学院这样具体的目标。

伯林在《我的学术之路》中举了一个逃离监狱的例子作为解释自由的范例。我们想要的一切就是到监狱外面去，而

不必有一个具体的目标（积极自由）。我认为伯林坚持反对自由具有三位一体式的意义这一立场是正确的，而且关系重大。

如果伯林对自由的论述仅仅止步于区分自由的两种意义，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那么他只能算是不辜负对自由的信仰，却并没有成就任何了不起的东西。然而，他确实成就了了不起的东西，不是因为他澄清了自由的概念，而是因为他揭示了涉及自由观念的情感。这牵涉自由易于为奸者窃取的本质——从高尚者手中被卑劣者窃取，从善良者手中被残忍者窃取。积极自由作为摆脱内在心理约束的自由，意味着要将精神分割为“理性与高尚的”和“非理性与卑劣的”，这样一来，自由就意味着让更好的自我居于主宰地位。然而，一旦我们分割自我，其他人就可能以我们那更好的自我为名，指责我们屈服于我们的卑劣自我，而他们是来解放我们的。许多残暴的统治者就曾利用过“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借用斯大林的说法）的角色做这种事。

伯林的论述之所以弥足珍贵，正是因为他向人们揭示了这种伴随着积极自由的情感。对于伯林来说，用于解释自由情感的戏剧演员的比喻，以及逃离监狱的范例，可能不仅需要语言层面的阐述，更需要一整套相关的情感联想，包括像《菲岱里奥》中囚徒合唱团唱的“赞美这一天！”，逃脱监狱的原始情感就是一种对自由的表达；它基本上就是自由的情感；而在这方面贝多芬是最好的向导。

伯林对于观念的力量信仰

伯林认为，观念获取力量并不仅仅甚至并不主要依靠它们的意义，而是依靠它们与情感和其他联想的联结。观念的力量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休谟曾经提出一个观念，后来由伯林的朋友 A. J. 艾耶尔发扬光大，这个观念认为，道德规范是没有意义的情感，一条条的道德只有情感意义而无认知意义——所谓认知意义，即与真理或谬误相关的意义。在这个方面，观念并无力量，有力量的是情感：驱使我们行事的不是意义，而是情感。

在伯林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有行事的能力。约翰·奥斯汀和伯林的终生好友赫伯特·哈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通过语言行事，语言有行事的力量。在一场婚礼上，那句众人皆知的“我愿意”正是举行这场婚礼的关键——成全一对喜结连理的夫妇。

伯林对力量的观念非常感兴趣，这一点为他的文章《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所证实。他警觉地听出了掩盖在那句洋洋自得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之下丑陋肮脏的内涵——“某种非常卑鄙或残酷的决定”^[1]。但除了力量的观念，伯林还十分关注观念的力量，坚定地相信人们会在它的影响下行动

[1] 参见下文第 163 页。

和反应。不过，他认为观念的力量主要来源于政治逆境之中，尤其是在赤裸裸地使用权力压迫观念的政府统治之下。

这就要谈到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终其一生的痴迷。他们在无比艰难的处境中发展和保护了各种观念。伯林的这种痴迷充分体现在了他那篇令人难忘的文章《知识阶层的作用》中。他对俄国知识阶层是什么态度？如果说伯林的民族认同是站在犹太人一边的，那么他主要的“阶层”认同则是站在俄国知识阶层一边的，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不过，这种认同是很矛盾的。如果要问起伯林对某件事的态度，我会用屠格涅夫作为参考的“晴雨表”，通过他来估计伯林的好恶和观点。伯林曾多次将明明是他自己的感受说成是屠格涅夫的。所以，他在文中写到屠格涅夫对俄国知识阶层的态度游移于“有保留的支持与冷嘲热讽之间”^[1]，尽管这和屠格涅夫的真实观点有出入，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在我看来，伯林就算是在受到高度赞扬的时候，也不会以思想家自居，他的内心超乎常人地谦逊，他将自己的感觉归之于屠格涅夫，正是其谦逊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和屠格涅夫一样为勇气而烦恼，或者说他们都缺乏勇气，这一点屠格涅夫曾在《海上大火》^[2]中

[1] 参见下文第 129 页。

[2] 伯林译于 ‘An Episode in the Life of Ivan Turgenev’ (《伊凡·屠格涅夫的人生插曲》), *London Magazine* 4 no. 7 (July, 1957), 14—24; 再次发表于 *First Love [and] a Fire at Sea* (《初恋 [和] 海上大火》), London, 1982; New York, 1983。

提到。

伯林和屠格涅夫都“对神秘主义、超验主义、幻想的宗教体验感到陌生”，而且两人在“进步主义、唯美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生活、上剧院看戏剧的喜好”，以及最重要的“享乐的能力”方面也步调一致。^[1]

简单地说，伯林对屠格涅夫这位人类情感大师怀着非同一般的亲切感。

在伯林笔下，将俄国知识阶层同西方知识阶层区分开来的关键特征是“人的划分”^[2] (compartmentalisation)。在西方文化中，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独立性，独立于创作它的作家。作家与作品的分离是西方的一大标志。而伯林认为，俄国最著名的文学家都完全不接受这一看法。

伯林认为，俄国知识阶层不接受作家与作品相分离的观念，他的这种认识究竟是否正确？我对此表示怀疑。正是俄国首先开创了“俄国形式主义”这个流派，其拥护者（包括鲍里斯·艾肯鲍姆、罗曼·雅各布森、尤里·特尼亚诺夫、维克托·什克罗夫斯基）都支持文学艺术作品的独立性，认为诗性语言的文学手法与结构优先于作品的其他特征。这些俄国形式主义者都不是无名之辈：伯林对他们非常了解，绝

[1] ‘The Gentle Genius’, review of *Turgenev’s Letters* (《温柔的天才》，对《屠格涅夫书信集》的评论)，ed. and trans. A. V. Knowl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 October 1983, 23—33, at 24 and 23.

[2] 参见下文第 128 页。

对会把他们视为俄国的知识阶层。

我认为，俄国知识阶层和西方知识阶层的区别并不在于“人的划分”，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也许二者的真正区别应该在信仰中寻找。我觉得，俄国知识阶层对观念的力量有一种着魔的信仰，西方知识阶层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这种力量心存疑窦。在俄国，即便是那些认为观念的力量来源于经济关系的人们——比如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伯林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这样的思想家——事实上也对观念的力量怀着深深的信仰。

我知道我对俄国和西方区别的看法存在反例，泛泛浏览一下观念史就能发现，这些反例无处不在。例如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和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他们就是典型的屠格涅夫所说的“多余的人”^[1]：他们属于知识阶层，但却觉得自己全无用处；他们是观察者，有时会显得精明滑巧，但却绝不是行动者。多余的人觉得观念，至少是他 / 她自己的观念，缺乏社会力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虽然能转，但却什么也带不动的轮子”^[2]。 xx

我想说的很简单：观念史是一个相当捉摸不定的领域；对观念史的概括很像一句谚语——要找到正面例证和反面例

[1] 参见下文第 89、108、110 页。

[2]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哲学研究》，Oxford, 1953), § 202。

证都轻而易举。

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观念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一生着迷于卡尔·马克思。这种着迷和他关注观念的力量有很大的关系。

在本书中，他的文章《卡尔·马克思的哲学》透露了为什么马克思让他又爱又恨。伯林没有跟随大流将马克思和列宁混为一谈。他对于列宁之前的马克思是何模样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解。他是在对抗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技术能力决定有意识的人类生活轨迹，亦即历史。这个观点最让伯林不能接受的地方在于：“人发明的技术决定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需求决定观念，而非观念决定需求。风车创造了封建制度，织布机创造了工业革命。”^[1]

马克思除了他本人的观念外，还有许多附庸，这些附庸观念形成了一个保护带，维护和说明着马克思本人的观念，一方面使他的理论成为不可撼动的真理，但同时也令其变得索然无味。除去这些附庸观念，马克思本人的观念大胆宣称，物质条件决定观念。伯林不相信历史有任何特定的前进方向。

xxi 观念和物质条件相互作用，朝着所有可能的方向发展，没有

[1] 参见下文第 141 页。